

严安生 著 陈言译

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毫釐無計逃神矢

严安生 著 陈言译

靈臺無計逃神矢

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NIHON RYUGAKU SEISHIN SHI

by Yan Ansheng

©1991 by Yan Ansheng

First published 1991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 严安生著；陈言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ISBN 978-7-108-06068-6

I. ①灵… II. ①严… ②陈… III. ①留学生—学生生活—研究—日本  
IV. ① G6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467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7-83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74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 第一章 留学日本与“中体西用”

风云起处是舞台	001
出洋一年，胜过读书三年	005
不要仿效“舍己耘人”的日本	007
重新确认“忠孝为本”	012
树立“国家之观念”	015
从“姿三四郎”热说起	019
嘉纳—杨度辩论揭幕	023
嘉纳也说：不要学日本	027
“到日本来，然而又是拜么？”	030
从怀疑到警惕	031

## 第二章 神山·梁山泊·“文明商贩”

### ——留学生心中的日本像

不服输的一群人	035
---------	-----

“文明的母国”对“积极进取的母国”	042
梁山泊与松阴塾	048
“至东瀛兮，乃以汉魂而吸欧粹”	053
“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	057
于异域“振大汉之天声”	061
被激励的国民教育理念	068
连林黛玉都被唤醒的女子留学	075
“兴学”现场的氛围	081
“速成法政”与猎官的洪水时代	091
潮流的变迁	097

### 第三章 “人类馆”现象与“游就馆”体验

大阪博览会上的人类馆	104
“太平之民安从而知”吾心之痛	110
遭人指戳之后的耻辱烙印	115
在“文明”与“野蛮”的夹板中	120
“躑躅于东京之市的拖尾奴才”	127
蓄发、断发皆为受难之源	132

台湾馆里听警报	138
“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的游就馆	142
附录——代结语	149

#### 第四章 在日留学生与日俄战争

喜迎对俄开战的中国人	153
与开战前史相关的日本留学事始	157
“真正令人羡慕死了”的光景	163
蔡锷的思考与主张	167
“军国民”热	173
得不到回报的声援与期待	178
当听到“我们为中国而与俄国开战”	184
日俄战争刺激下的士官留学	188
士官留学的变迁	192
登上时代舞台的那群人	197
被拉到列强争夺的场域	206

## 第五章 到达日本的前后·软硬两种摩擦

“奋身东渡探神山”	213
浮槎海上	222
“黄海旧战场”	230
被叩开的海，忧郁的海	234
登陆长崎之后	240
抵日第一餐	245
榻榻米上的安宁与焦灼	251
入浴摩擦	257
“自治公约”的表与里	264
服装上的拘执	270

## 第六章 留学生活诸样态

“畸形的学校生活”	280
师生之间	288
国旗事件与教科书问题	295
与就学状况相关的公使报告	303
“留学界的普遍风气”及其暗流	310

留学界“满汉相克”的图景	319
留学生管理诸相	327
讨人嫌的游历官绅	344
精英的哀欢	352
后记	365
译后记	371

# 第一章 留学日本与“中体西用”

## 风云起处是舞台

似乎有这样一种定说：甲午战争之后的 1896 年，驻日公使裕庚通过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把十三名中国年轻人的教育事务委托给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始开近代中国人留日之先河；两年之后，清末开明派名臣、湖广（湖北、湖南）总督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则吹响了中国人大规模留学日本的进军号。<sup>①</sup>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并非始自留日。甲午战争前三十余年，1862 年左右，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驱、最初的推动者容闳（曾因就读教会学校的关系而于 1847 年至 1854 年间到美国留学。这位非政府公派的人物，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就开始宣传派遣留学生的意义。然而他为说服清政府高层，竟然耗费了十年时间，直到 1872 年，才说动了当时洋务派的高官曾国藩们，使他们决定正式派遣留学生。历史上有名的

<sup>①</sup> 参考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 年；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一书房，1981 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 年。

一百二十名学童渡美留学、预定修业期限十五年之事，在当初是个果断大胆的计划。<sup>①</sup>它反映了自新大陆归来的容闳的远大胸襟，让人感到了他为改造祖国而培育人才的热切期盼。然而与这种意图相违异的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了体制内的近代化事业即所谓“洋务运动”的框架之内。

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之后不久的1860年代初期，洋务运动肇兴。部分有买办色彩的满洲贵族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起家的地方实权派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们是这场运动的主角。有观点认为，虽然洋务派官僚们常常把西洋的“坚船利炮”挂在嘴边，但直到遭到了英法联军的进攻，国人才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就理应明白的事儿。相比较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具有本质意义的重要事实在于：曾国藩、李鸿章们在被太平天国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同时，却更是被那些在1860年与太平军决战中起关键作用的雇佣军折服了。那些由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雇佣军勇猛善战，意志力顽强。曾国藩、李鸿章们亲眼目睹了“洋枪队”的战斗力，认识并且尝到了“坚船利炮”的厉害，以及跟它所象征的西洋侵略势力相勾结的甜头。正是由此而掀起的洋务运动，在容忍了英法等国势力侵略的同时，也获得了后者的技术指导，创办了一两家造船厂和兵工厂，训练了一些自己的水师和陆军。要言之，这一切不过是强化了统治体制。而为这种极为狭隘的功利目的展开的教育和留学活动，最后则被限定为“方言”与“武备”这两端。前者就是外语教育，培养与英、法交涉所需的人才；后者则是培养

<sup>①</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建设新式陆海军所需的士官、航驾技术人才以及造船和制造武器的技术人才。最初的留学欧美者尤集中于后者。就在派遣上述一百二十名留学生之际，曾国藩等亲自制定“规程”，要求这些学童完成预备教育之后进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技术。接下来，李鸿章们对于 1875、1876 这两年派遣的首批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留学生，更是从起初就规定只准学习兵船的驾驶与跟造船相关的技能。<sup>①</sup> 也就是说，只要求他们成为战争的工具。违抗此命令而稍露骄狂不逊的赴美国的留学生被中止留学；温顺驯服的赴欧洲留学生则被当作道具使唤。在黄海海战中，洋务派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遭到全歼；那一大批坚守在舰船上的留学英法的士官们，则作为洋务运动路线的牺牲品而葬身鱼腹。

1894 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宣告了李鸿章们洋务运动路线的终结，也成为迎接激荡的中国近代史后半段的转捩点。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梁启超记戊戌政变时开头劈首的两句警语。<sup>②</sup>

如今说来，正是此次对日战败与签订割让台湾等地的《马关条约》，揭开了中日黑暗时代的序幕。诚如梁启超当时所言，唤醒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意识，为日本留学运动的勃兴准备好了

<sup>①</sup>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6 年，参考第三章“欧洲留学之始”，第 14—21 页。

<sup>②</sup>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70 页。

了舞台的，恰恰也就是这场战争及惨败。

那时整个的时代氛围容后再谈，我们首先会发现《马关条约》缔结后引发的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十分有趣。事件本身不仅让日本恼恨不已，而随后俄、德、法和英国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掀起的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更使得日本朝野的大陆帮加深了危机感：如此下去岂不是断送了三年前其价值就已经被削掉一半的“头等股票”？西欧列强相与瓜分，东洋新兴强国日本进出大陆的余地岂不会越来越小？如此这般，在瓜分达到最高潮的1898年11月，东海彼岸的东亚同文会（近卫笃磨任会长）应势成立，发出了再也不能坐视“西人蚕食”，不能“隔岸观火”的呼叫。于是该会出台了《纲领》，第一条即提出“保全支那”，并且为此将目标瞄准“像张之洞那样”的北京以外的实权派，要对其进行游说，让他们忘记“战败的仇恨”，力陈“列强的阴谋”，灌输推动“亚洲的门罗主义”和“日清同盟”等理念，并且据此展开了整套拉拢中国的“组合拳”。<sup>①</sup>而热烈欢迎中国人赴日留学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之，日本方面积极地提供了留学运动的舞台。

而最初在这个舞台上亮相的，一方是革命派的孙文，另一方则是君主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这只能说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他们皆因在中国国内变法或革命失败而亡命日本，各自在日本重整旗鼓，正好有像等着新的后备军即留学生到来一般的阵势。这样，可以说已经为上演波澜壮阔的历史连台好戏搭建起了无可挑剔的舞台。

那么，留学生们又是如何登上这个舞台的呢？

<sup>①</sup> 阿部洋编：《日中关系与文化摩擦》，岩南堂书店，1982年。

## 出洋一年，胜过读书三年

意想不到的战败与屈辱的媾和，把睡狮从“四千余年大梦”中唤醒了。要是败给英、法等欧美列强倒也罢了，这次却败在“区区三岛”（那个时代中国的文人社会仍然认为日本是“东瀛三岛”，并且普遍以此代称）的手下，中国受到的冲击就格外强烈。忧国之士切齿扼腕，同时又不得不直面现实，去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发出了自己酣睡不醒的时候，“小国”日本“何兴之暴也”（《劝学篇》）的疑问；而“变法自强”的口号，一时间也无人无处不在高喊。以北京、上海、长沙为中心传播的变法自强思想，在包括一部分后期洋务派官僚在内的全国知识人中间流播弥散，前所未有的新风气喧腾开来。与洋务派曾经提出的自家受用、具有欺骗性的“自强求富”不同，这才是大多数人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是一种“只有像明治日本那样进行变法始能自强”的思想，它的认知始终以变法为中心。

其间形成了如下图式：非变法不足以图强，非兴学不足以变法，非游学不足以兴学（且提及游历尤优于游学）。<sup>①</sup>这种图式虽然过于单纯，但在那样的时代也只能如此。就如前面梁启超所言，自1895年之后的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紧张、兴奋，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时期，即便从留学史的角度看，虽然起初尚显得混沌不清，但那确实也是为留学运动的展开而不断地积蓄起充盈的、用之不竭的能量的一个时代。

<sup>①</sup>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23—624页。

通过变法、兴学和游学，气运不断上扬的是维新派知识人与后期洋务派官僚。然而对这种现象进行总结提炼、使其纲领化并且广为普及、产生极大影响的，是位高权重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与之相关的上奏文和章程规定之类。

张氏谓：

学堂固宜速设矣，然非多设不足济用。欲多设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员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略）是则唯有赴外国游学之一法。<sup>①</sup>

提出此主张的张之洞进一步极而言之：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入中国学堂三年。<sup>②</sup>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于张之洞而言，兴学是被视为“新政”的一环来提倡的，故他力主游学之必要，但是对关键的兴学与变法的关系以及兴学的方针，他却含糊地几乎只字未提。

要变法，首先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兴新学、培育人才，当时中国的很多人对此局势已然是洞若观火。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变法维新的下层知识阶级，他们无位无禄，尤为痛切地感受到启用新人的必要。1898年的维新变法推动光绪皇帝首先断然实行的，就是对维新派人物的拔擢和任用。对此，张之洞不可能不明白。毋宁说，或许正因为很明白，他才从自己高官的立场出发规避了它。现代人所说的“人事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很复杂缠绕，特别是在改革时期，更会成为尖锐争执的焦点。是反

<sup>①</sup> 张之洞：《变法自强第一疏》，载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23页。

<sup>②</sup>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收入张之洞《劝学篇》，湖北书院，1898年。

对改革还是赞成改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改革，立场与态度不同，人才培养与任用的标准即兴学的方针也自会不同。对于维新派而言，这是关涉改革事业成败的问题；然而对于保守派而言，那有可能是影响统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因而游弋在两者之间的新派权臣张之洞，一遇到这样的关节点也就不免犹疑拖沓起来。以上说的是政治的一面。

相较之下，这里想从留学运动的角度来关注一下问题的思想文化方面。张之洞在兴学方针上表现得犹疑拖沓，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是因为与中国受到的是远比日本等更为突然的“外发的”波涛冲击——冲击之下，是“中学”（中国的学问）还是“西学”（西洋的学问）、是“体”还是“用”，这一崭新而又古老的问题也被陡然放大，呈现在国人面前——这一重大事态有关。因此在叙述留学运动的思潮之前，想试对高潮底部的思潮与时人的观念进行一番探讨。

## 不要仿效“舍己耘人”的日本

与情势认知和政治主张等不同，只要涉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或者价值观念，就往往不能轻易地遵循政治逻辑去判断。那时，全国上下都大致明白了：危机迫近，不得不变法；变法，不得不兴新学。然而既然要兴新学，迄至那时具有极大局限性的形而下的模仿已经行不通了，不得不全盘吸收西洋的文化。这样一来，照例地，中华思想就要抬头。中华民族是素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傲的，更不用说那些知识精英们了，这些人可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折服了，他们甚至由衷地感到痛苦。

用当时的话来说，那就是“舍己耘人”（根据《孟子·尽心篇下》中的“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而从这种夹板中历经两难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似乎也可把它与“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加以类比，然而至少在与“和魂汉才”比较时，可以说二者发生的时期与情境不同，并且表现的姿态和价值判断也迥异。

《劝学篇》中这样写道：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sup>①</sup>

也就是说，“存中学”乃目的，“讲西学”则为手段，“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其论述之稳健与周详委实富有中华思想之特色，故无须过多解释。

有趣的是，刚开始讨论“中体西用”时，正是把日本引为“舍己耘人”的坏典型和警世的反面教材的。此前的1896年8月，孙家鼐<sup>②</sup>在关于开设京师大学堂的“议复摺”中，明确提出“中体西用”路线，这与两年后张之洞的思路不谋而合，但他那番首举日本作“反面教员”的恳切陈词却显得有力得多。附

①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之“循序第七”。——译注。原作此注为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②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寿县）人。清咸丰九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卒后谥号为“文正”。

带说一下，因其地位与分管职责，孙家鼐对同年3月新任驻日公使裕庚已经带领最早的十三名留学生东渡日本之事应该是清楚的。尽管如此，他仍然这样说道：

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绝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耘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sup>①</sup>

发出此番言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两年。或许他是想表现出抗衡冲击不动摇的姿态吧？而两年过后，就到了《劝学篇》的时代。此时面临的已然不是设不设京师大学堂的问题了，取而代之的是“唯有赴外国游学之一法”，并且“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即号召的恰恰是留学日本！时隔两年，“防线”就这样轻易地被突破了。以一直沉滞不前的中国历史来看，此变化又何其速也！

但是作为其根底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未如此简单地发生改变。尽管确定了以仿效日本为方向，然而在留学日本的过程中，如何践行“中体西用”呢？

进入日本学校学习，这原本意义上的留学，1896年的十三名学生无疑是第一批，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890年6月，就已经派遣过一次预定要留学的学生了。跟后来正式的第一批留学

<sup>①</sup>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七变法类》。